

## 重点推荐

在诸多文学样式中,散文大约是最不容易研究的。散文的形式高度自由,几乎可以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而其精神内涵也应当是无比自由的——要对这样的对象发表评说的意见或叙述其发展的历史,其难度即使难比上青天,总归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即以散文史或史论而言,过去最容易看到的格局是先分时段再分流派和作家,按部就班地一一道来;如此则头绪大抵是清楚的,所论亦可自有其深度,但弄不好也很容易成为流水账录鬼簿,在教学中也许还有若干用处,要想给人以启发,就比较困难了。

最近读到林贤治先生的大著《中国散文五十年》,颇为兴奋。此书气象和章法都是全新的,而且锋芒毕露,时见警策,批评当代散文及有关作家不稍假借,读起来很过瘾。现在温温吞吞的书是太多了,有些甚至让人昏昏欲睡,简直没有多少兴趣和精神把它看完。

《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除代序《论散文精神》和代跋《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之外,正文的六章分别是:一、根,二、干,三四五、枝叶上中下,六、其他。可见这是一株根系发达树干挺拔枝叶扶疏的大树,而其中中心就是自由精神。作者在一头一尾中写道——

人类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

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失却精神,所谓散文,不过一堆文字瓦砾,或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间而已。

散文并非王国,乃颇类联邦共和国,在每一块疆土之上,弥着同一种共和的空气:人类自由精神。

## 百家品书



《大地汉书》,在我看来,它是一部诗意的书,是一首绵长、丰富、充盈的长诗——在这里,诗性甚至成为了小说的推动力,它一次次给叙事注入涌动和涡流,使它变得起伏、延绵,构成阅读的吸引。在当下,我们的生活和写作日趋平庸,越来越缺乏诗性的当下,《大地汉书》有意构成一种反驳、一种具有幻觉性的世界。这种诗性,我在维廉·福克纳的小说、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中曾经读到,包括中国的余华、格非前期那里——诗性的匮乏在本质上是幻想、理想、才智的匮乏,是艺术能力的匮乏,是一种只能沉陷于所谓现实泥沼里的平庸——当然,当下我们的文学评判似乎在鼓励这种平庸,赞赏这种平庸,推动这种平庸……所以,诗性的《大地汉书》在日前这种环境中更显得珍贵。

在对《大地汉书》的阅读中,我们发现,丁庆中的文字有一种酒漫感,就像毛笔笔尖上的墨汁落在宣纸上。这种酒漫使得小

是,生活就像高伟的书名《生活从来不肯简单》,多简单的常识。我们恰恰能掌握常识的原理,却偏偏走不出常识的桎梏。这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在掘进真理的深度时还少了那么一截,顿悟不到让灵魂开窍的境界。

不肯简单的生活,源于我们物欲的不断膨胀,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源于生命有限而欲望无限。让“不肯简单”的生命实现数学公式似的删繁就减,以此拯救我们苦难的灵魂,这无疑需要大的人生智慧。

《生活从来不肯简单》就是一部意在救赎当代人心灵的思想者随笔。作者以一个敏感、智慧的个体生命体验,去安慰那些痛苦、悲凉的人。在高伟羸弱的身体背后,她以她强大的灵魂支持那些心灵疲惫、精神无力的她,这其中更包括她自己。以哲学的思考和诗人的警觉去透视生活背后,是高伟作品的“主旋律”。

没污染的河流也不会清澈见底,没有哪个生命的瓶子经得起物欲的搅动。高伟在作品《不要晃动生命的瓶子》中就看到:“生命就是这么一瓶装在瓶子里面的黄河水……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怜惜自己,责怪命运的不公,那么就等于把整个瓶子晃动起来,让生命的整个状态浑浊不清……现在我知道了,什么时候我一晃动这个生命的瓶子,什么时候我就看不清外面真实的世界。”正是高伟的价值观念使得她的作品

# 什么是振兴散文的可行之道?

——读《中国散文五十年》 □ 顾 农

这一层意思在正文当中又不厌其烦地反复过许多次,当然是变换了词句,又另加许多舶来品的引文。作者的主题无非就是大声疾呼地呼唤自由精神,所以张中晓、邵燕祥、王小波诸家得到很高评价,这自然是很好的;而凡是同这种精神有所不合的散文作品,在本书中一律受到尖锐的批评。

这样的立意决定了本书的书写策略必然是以论带史,因此其中略去了许多难以或不便纳入这一框架的散文作家,例如写作过程几乎贯彻于这50年始终的季羨林、黄裳、舒芜等前辈散文家在这里完全没有被提到,这样被遗忘的人物还有若干;大量的学者散文随笔也被过滤出去,据说“学者准学者的东西,一大特点就是拼命往博雅的路上挤,因此,说到底还是‘大众的戏子’”。这样来横扫一切恐怕是有点过头了。实际上林先生这本书也是旁征博引(其中引用西方学者的各路高论甚多)、相当高雅的;本书封面勒口处的《作者简介》也说作者是“诗人,学者”——但难道能说他也是“大众的戏子”?作者是有思想有见识的,即使时有偏激的言辞,也未必竟会与戏子为伍。当然,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评说所有的作家,只是遗漏太多总归成一遗憾,至少也同书名不免小有出入。

以论带史最容易高明有余,沉潜不足。幸而此书的精彩之处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我读此书非常佩服其中犀利的批评,林贤治先生不因对论及的对象是尊者、贤者而有所避忌,例如其中断言“大多公开出版的散文,很少脱掉‘八股’的模式”;又如书中提到孙



犁说:“他经历过自40年代以来有人因写文章得咎的教训,本人也遭受过批判,所以愈到了后来,愈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怕犯错误’。他写作时主动远离政治,远离重大事件,回到平凡安恬的乡村生活中去。这种选择同性情有关,同诚实的记忆有关,但同避祸求全的世故也未曾没有关系”;“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还会常常见到节制,淡泊,退让,保守,而不见热烈的抗争……”这些批评固然并非无据,但是说整个30年全是八

股,孙犁因为未作“热烈的抗争”就是“世故”,恐怕不免是苛论。文学史上的名著从来都不全是也不会全是“热烈的抗争”,这才成其为联邦共和国,而非大一统的王国。在本书中没有受到过批评的鲁迅,作品的色彩其实很丰富,并不完全是抗争;鲁迅也自有他的世故或曰策略。散文的天地非常广阔,作家应当有他创作的自由,也有选择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的自由。批评家、文学史家似无须越位而多所指责。

作者高举自由精神的旗帜来衡文论世,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书中对于那些未尝高扬“自由”的散文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像这样不容忍他者的作派,弄不好也许会变成一种“法家”气。散文的领域何妨更宽广些,品评何妨更大度些。

提倡自以为然的东西,固然是一种当然;而容忍不以为然的东西,别人才有自由。世界上有过以“礼教”为旗帜的专制,也有过打着“革命”大旗的专制,将来会不会出现另一种以“自由”为口号的精神上的专制呢,最好不要出现。

我在拜读《中国散文五十年》一书时虽然陆续冒出若干不免多疑的想法,但仍然觉得散文史也可以这样来写。独抒己见、旗帜鲜明总是好的,即使有些天马行空的高论也无妨;何况其中确实多有发人深思之处,这已经很尽了一位学者的责任。解放思想,自由抒写,有所倡導而又能欣赏异量之美,我想这大约才是繁荣创作、振兴散文的可行之道或光明大道。

《《中国散文五十年》,林贤治著,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两个寓言化的人物作者都爱,他没有过分地偏袒其中的任何一方,没有把对错、好恶引向单一向度。书中的父亲刘世行,李六根,二朝三朝四朝,王国刚,在他们身上都有某种的寓言化指向,他们的身上都背负着“一类人”的共通和命运,丁庆中通过他们——具有寓意深度的他们,刻画了当下农村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改变,从而使这部书变得丰厚而繁杂。在第16章,丁庆中如此定义他笔下的“红镇”：“红镇非常丰沛,狂野,艳冶,飘逸,灵敏,聪慧,荡漾,淫秽,高贵,傲慢,神秘,散乱。你可以知道它的名字,片面地知道她那么一点点。你不可能把它了解得那么透彻。对于我们,它就像一棵树那样。”是的,我也必须承认,对于我和我们,这部书,就像一棵树那样,是一种生长的、还在葱茂着的状态。

当然,这还是一部寻找“童真”的书,它不只是董红琴的命题也是丁庆中的命题,在这个时刻,丁庆中更像一个堂·吉珂德,《大地汉书》采取了一种回望姿态,一种朝向我们惯常以为的“正确”反方向行走的姿态。书中,一直埋伏着对童真的寻找,他告诉我们,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就找到了。对童真的寻找并不意味着丁庆中故意一叶障目,通过忽略掉这个世界尤其是眼下这个世界的复杂和道德下滑而建造一个什么“成人童话”,就像琼瑶阿姨的小说和电影所做的那样——不,丁庆中的寻找并不建立在那里,他对自己、对世界和它的复杂性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所以,他对童真的寻找才显得那么孤立而可贵,他才说,“童真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像我爹、我娘、二朝三朝四朝,还有小枣核儿大咧瓜胎里坏,王国刚董红牛都需要童真。达到童趣的目的就是为了享用,在享用之前就失去了。在得到前就丢失了。得而复失而复得。《大地汉书》使我们以为我们明白的“童真”重新成为了问题。

《《大地汉书》,丁庆中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 诗性·寓言和童真

——对丁庆中《大地汉书》的一种解读 □ 李 浩

说有了更多的向度和可能,使一种相对简单的朝向有了丰富和复杂。他那么善于由一及二,由二及三,让你读出微妙、会心和幽默。譬如,“小枣核儿和王国刚一句也没有聊到升官发财之道,老是聊书上的那些。大儒董子,像大儒似的董驯牛,孔子和孟子。他们这些话就包着一层层皮,这些皮从来不会剥。这些话包着这层皮,还像话。要是没了这层皮,就不会像话。包一层董子,包一层董驯牛,包一层孔子,包一层孟子,还要包一层诗,还要包一层文章……”这里面话里有话,话里套话,趣味盎然。再如,“在这些年间,我们都有发现,但都在保持着。我娘发现了旧衣和旧被褥,我爹发现了那把铁锹,红琴发现了猫啼草的同时,还发现了毛笔和书,龙发现了一把锄头,二朝发现了充满香气的世界,三朝发现了声音,张惠玲发现了男人的同时,还发现了取之不尽的财富,所以她用嘲弄的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这酒漫出来的“发现”有一种提醒感,让我们回过头来品味小说前面的叙事,思考每个人“发现”中的细妙包含。

毫无疑问,《大地汉书》还是一部寓言之书。叙事语调的诗性恰当地加重着它的寓言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丁庆中对他笔下人物的精心赋予。书中的主体人物,主体叙述者是“我”,这个“我”被作者赋予了强烈的代指,这个“我”是农民,是坚守和固执的农民,是一种反方向的钟,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的困惑、两难、无力、木讷和美德,这一个被立起的“我”,当然是丁庆中有意甚至是刻意的设置,丁庆中让他的存在成为一面“反映”当下的镜子,就像在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我”的那种

固执的,有关大地(“棒子”)的爱显示着某种的悲壮、可怜和可叹,在当下这种语境氛围里,他是孤立而孤独的,大约就像《大地汉书》的写作者丁庆中,我似乎能够寻到这个“我”和那个“我”之间的内在的、血脉中的关联。小说中,“我”有了一个儿子,叫龙,他一方面接受着母亲董红琴知识的滋养,一方面又“发现”着锄头,接受着做一个农民的全部继承——在这部寓言之书,无论是儿子的这个名字还是他身上的继承,都具有强烈的寓言感,在他身上甚至寄托着写作者的某种理想,是种“理想化身”。

书中有两个主要的女性,张惠玲和董红琴,她们那么不同:张惠玲泼辣、灵透,有着某种巫性,而在董红琴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梦和自我世界的沉迷,某种书卷气,耽于幻想,柔弱中的坚韧……更大的、更本质的不同在于她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张惠玲过早地目睹和体味着这个人生的恶和劣,她世故而又盲目,破罐破摔,“我就是这样的人,天生的,一生下来就注定了,我干了还是没干,都会落这样的下场,就像我娘一样”(《大地汉书》第二章)。“她觉得不管自己怎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她这样做就像一个人想把大海变成甜水,就往大海里撒糖”(《大地汉书》第十章)。这种对世界的认知恰也成为她日后行事的注脚,这一认知让她走上了之后的方向。董红琴则是欢快的,即使她也遭受过包括来自婆婆的对抗,也曾涌流过泪水;她写诗,抄录古诗《皇天汉地》中的文字,“小题大做”,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但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对世界的眼光,另一种属于自我的标准。可贵的是,这



具备了穿透人性表象的力量。她的价值观源于她思考的不是“私人化”的写作,她表达的不是她私人房间中的琐碎与无聊,我们总能在高伟的作品中看到她对人类普遍的关注与追问,是所有人都曾经体验过的困惑与烦恼。

比如在《真相是可以杀人的》一文中写到:“文化与人类社会自然形成的伦理,最大限度地把这些人性之恶的原罪面具化、表面温情化,使得更多的人性丑恶以潜伏的方式压抑于生活的内部……就是这些潜伏于生活内部的难看的東西被偶然打

# 拯救苦难的灵魂需要智慧

——读高伟随笔集《生活从来不肯简单》 □ 阮 直

开……那么真的就可以杀死人的。”相信这不是一个生命个体的惟一体验吧。约翰逊博士在评价莎士比亚时曾经说道:“除了给普遍性事物以正确的表现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被许多人所喜爱,并且是长期喜爱。”

高伟的随笔不是那种喧哗震动的文字,她的写作沿着一条平静进行的道路,脚步不急,是因为她从不癫狂。不在人性的负极上对接,就不会有灵魂上的短路;不怀着负面的情绪审视人生,就不会硬化自己的心灵。在《要做就做铂金女人》中高伟写道:“金质的东西,即使外观被尘埃蒙垢,稍一擦拭,便会呈现我新买它们时同等的质地,一点儿都没有走样。它们被我一天一天地佩戴在身上,它们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使用而丧失了自己的优雅和品质。它们跟随我出行,安静地趴在我的身体上,以自己永远的情无旁骛强调着自己的纯净。”

高伟的这些作品被纳入心理学随笔的范畴,我认为是恰切的。虽说她的语言都充盈着精微的诗体意识,但它深广的哲学

思考完全是为人心理上的疼痛做的慰藉。在《我们不懂得别人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一文中高伟写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应该质疑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特别相信自己的情绪——这个情绪让我真的产生愤怒,我的心在狂跳,我的血压升高就是这愤怒的证据,怎么说它是假的呢。其实,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让心狂跳,不让血压急剧升高。我们的情绪只是一些妄念。让我们高兴的情绪是妄念,让我们不高兴的情绪也是妄念。让我们高兴的那种妄念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去努力培育这种妄念罢了。”这样的认知是减轻我们心理痛苦的思想钥匙。

欣赏高伟的作品,我很少想到她作品形式上的美感,诸如文本结构、艺术手法、叙述密度,这是因为她的作品总是先在精神层面抢先呈现,气韵压人。她的思想、认知上的深刻,使她的文学技巧并不显山露水,这正是她最高的文学技巧。

《《生活从来不肯简单》,高伟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 《老饕续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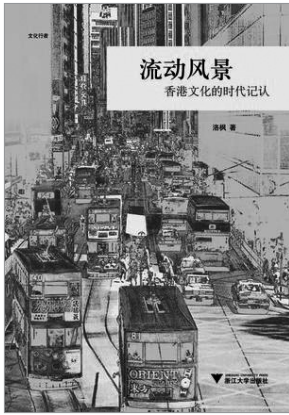
赵珩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1年10月出版

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赵珩先生的《老饕漫笔》。这本“低调”的小书凭着扎实的有趣的内容掀起了一轮饮食文化书的出版热潮,一时间坊间各种饮食文化类读物纷纷出笼。10年间,《老饕漫笔》一版再版,共印行了8次,同时也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出版,部分文章译成英文。10年过去,作者近日又于三联书店推出《老饕续笔》。

谈及动手写《续笔》的原因,作者赵珩在序言中表示:“第一本《老饕漫笔》既不是什么‘貂’,那么这本‘续笔’也就谈不上什么‘狗尾’了。只是意犹未尽,作为前者的补充,其中也有近十年以来的见闻。从写作的风格上讲,大抵还是《老饕漫笔》的路子。”

《老饕续笔》依然是一本与饮食有关的随笔集,全书40篇,用白描式的笔记体写食话,涉及各地饮食的方方面面,也有少量关于国外的见闻,写口腹之欲,记风物人情,述历史掌故,亲切自然而优雅,流露出作者对精致生活的一份眷恋。《续笔》亦延续了赵珩一贯清淡含蓄的风格,用平实的语调沉潜与饮食相关的方方面面。

## 《流动风景》



洛枫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本书向读者展现了一场叠影的、不安于位的、流动的香港文化盛宴。作者洛枫站在一道边界与越界的“黄线”之前,细述港岛人文地貌、时代印记与异变,透过梳理、解构香港社会背景下的文学、文化之寄存生态,从也斯到董启章、西西到黄碧云、叶辉到舒巷城,细数各家之长,出入于历史与当下,以及种种奇幻互渗的“拟像”,从而挖掘有关香港“地志记忆”之深层脉络,与我们分享“越界”旅行的心跳与愉悦。

## 《前卫之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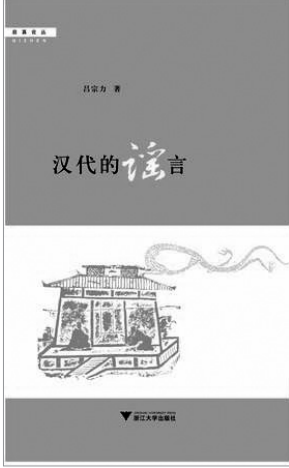


刘柠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年10月出版

本书为新生代学者和专栏作家刘柠近年艺术评论文字的结集,谈艺术不拘泥于艺术本身,而是把艺术放到其赖以生成的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力求再现其艺术背后的发生机制。本书分三辑。第一辑:人生即艺术。一些在艺术史上并非赫赫有名的画家、摄影家,但其风格独特,颇具影响,如薛谷虹儿、竹久梦二等,通过对他们生平及艺术风格的描绘、评价,再现一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史、文化史;第二辑:前卫之痒。谈的都是与前卫艺术有关的问题,话题涉及中外,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一定的理论性;第三辑:中国前卫。中国的前卫艺术已成为一个世界现象,也构成了中国经济泡沫的一部分。何以认识、评价它,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部分通过对中国前卫的一些总体性评价及个案分析、评论,展现中国前卫的一个侧影。

作者认为,前卫艺术在当下,是一个颇暧昧的定义。我们已然无法再像15年前那样,对冠以“前卫”名义的艺术一概脱帽、鼓掌。曾几何时,动静颇大的实验电影、先锋戏剧和小说等先锋文化运动风头已过,目前势头正猛的前卫艺术的前途也很难说。事实上,当“前卫”向“后卫”蜕变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可能是不可逆的,其生死存亡甚至也未必取决于其“钱途”。

## 《汉代的谣言》



吕宗力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出版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神语言或类语言作出反应,与之互动。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营销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是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朝廷种神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庙堂、民间的种种传闻,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揭示官方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度、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完整的解读。